



軍事戰略

當前中共對外政策的 限制與挑戰

助理教授 李明正

提

要

1978年11屆3中全會，中共確定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國家戰略，也改變了中共對外政策的思維，在配合經濟發展的前提下，以往強調政治掛帥採取與西方對抗的外交模式已不適用，取而代之的是強調和平與發展的理性務實外交路線。30多年來，中共極力以創造和平周邊環境做為外交的主要原則，期間經歷鄧小平、江澤民與胡錦濤等領導人，在因應國內外環境的變遷下，陸續提出獨立自主、睦鄰外交、大國外交、新安全觀、和諧世界等對外政策與論述，對中共的對外關係與國際地位有極大的助益。然而，在中共國際地位與影響力日益上升的同時，仍隱藏一些權力矛盾的結構因素，對當前中共對外政策形成限制與挑戰。

壹、前言

外交政策的制定，主要著眼於國家整體戰略，自1978年11屆3中全會後，經濟發展成為中共國家戰略的核心。而中共外交即是以達到此核心目標為依據。不論睦鄰外交、大國外交、夥伴外交，皆希望達到利於此目標的國際環境。中共學者王逸舟認為21世紀的中共外交，有三項基本的利益與需求，這三項基本利益及需求是：第一，發展利益及需求，即服務於國內經濟建設目標，爭取有利於改革和發展的相對穩定外部環境；第二，主權利益及需求，即保障領土、邊界和基本主權不受侵犯，經過一個較長時間的努力逐步實現國家統一；第三，責任需求及利益，即在亞太



區域發揮積極的、逐漸上升為主導性的影響，努力成為全球範圍內有影響力的、被公認為起建設性作用的國家。【註1】

當中共全力推展和平外交政策，以爭取有利於經濟建設相對穩定外部環境，達成第一項利益的同時，也面臨達成第二、三項利益的限制與挑戰。在主權利益上，即使中共採取「擱置主權、共同開發」及臺灣問題上採取「一個中國、一國兩制」的和平作法。然而，由於對主權的政治敏感性，在權力結構的矛盾下，最終定位仍將回歸權力本質，因此，第二項利益將對中共和平外交政策產生限制與挑戰；另在責任利益上，當中共綜合國力提升後，必然增加對國際責任與權力的需求，是任何國家在外交政策應有的作為，然而，此舉勢必引發國際權力重整，造成原有舊勢力的反擊，最終將在權力與價值認知兩方面全面對抗。因此，第三項利益也將成為中共和平外交政策的限制與挑戰。本文將在主權利益上，以兩岸關係的矛盾與領土主權的爭議來呈現；另在責任利益上，分別從權力與文化兩種視角，以「中國威脅論」與「文明的衝突」來分析，以此說明當前中共外交政策所面臨的限制與挑戰。

貳、兩岸關係的矛盾

自1949年兩岸分治以來，雙方對彼此的政治定位隨著國內外環境的改變有所不同，由於臺灣深具戰略價值，因此，在雙方政治對抗的矛盾中及外在因素的影響下，更增添不定的潛在因素。臺灣西靠亞洲大陸，面向浩瀚的太平洋，臺灣海峽最狹窄處離中國大陸僅為140公里。臺灣位於西太平洋南起印尼和菲律賓、北到日本和俄羅斯的堪察加半島(Kamchatka Peninsula)島鏈的中心。以臺北為中心，2000公里航空半徑之內，包括了朝鮮半島、菲律賓、沖繩、日本的九州、四國和本州的一部分，4000公里航空半徑之內囊括了關島、馬利安納群島(Mariana Islands)、加羅林群島(Caroline Islands)等美國在西太平洋上的重要海軍基地。臺灣海峽更是西太平洋的海上交通樞紐，臺灣獨特的地理位置無論對中共，還是對美、日兩國都有至關重要的地緣戰略意義，是中、美、日三國戰略利益的交匯之地。【註2】因此兩岸問題的矛盾除了牽扯到中臺雙方當事國外，也因美、日等國的介入，成為區域甚至全球局勢發展的重要議題。

對中共而言，近來隨著經濟快速發展，海洋控制日趨重要，中國大陸雖地處海陸兩棲之地緣環境，然而，面海出口被緊緊的包圍在西太平洋島鏈之中，在東邊和北邊有阿留申群島(Aleutian Islands)、日本列島、琉球群島，東南有菲律賓群島

註1 王逸舟，〈面向21世紀的中國外交：三種需求的平衡(上)〉，《對外大傳播》，2006年第8期，頁31。

註2 朱聰昌，〈論臺灣的地緣戰略地位〉，《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1年第3期，頁66。



，南邊有印尼群島及南海被東南亞等國的封閉下，實際上，中共的地緣條件是處於半封閉之不利狀態，臺灣成了中共面向海洋唯一的出海口，中共要向太平洋發展，就必須衝出第一島鏈。而第一島鏈的關鍵就是臺灣，臺灣問題不解決，中共的海洋戰略就會受到限制。21世紀是海洋的世紀，中共要成為區域乃至於全球大國，首先就必須克服海洋成為海洋大國，因此，臺灣問題是否解決是為關鍵。【註3】

另就國家安全的角度看，臺灣是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重要屏障，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素有中國「七省之藩籬」、「東南之鎖鑰」，是東南沿海各省的第一道天然屏障。它南與海南島相映，形成「雙目」，北與舟山群島呼應，構成「犄角」，以臺灣為中心，連接海南島和舟山群島這南北兩要點，構成一條天然而有力的品字陣戰略海防線，足以掩護東南沿海六省市及該方向的戰略縱深。如果臺灣無法確保，中共國防安全就難以得到充分的保障，而且國防戰略縱深一下就後退一、二百哩。因此，臺灣對中共國家安全至關重要。【註4】

目前臺灣與大陸相分離，對中共來說，不僅中國大陸東南沿海諸省以及內向戰略縱深的安全受到直接威脅，而且國家安全戰略伸縮的自由度十分有限，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經濟建設的主要成果基本位於東南沿海，更突出了臺灣對中共國家安全戰略選擇的重要性。【註5】近30餘年來，因中共經濟改革，及臺灣政治解嚴後，雙方不論在經濟、社會及文化交流越來越密切，然而兩岸卻因政治定位問題的認知不同，兩岸政治關係並未如經濟、社會及文化交流般步入正軌，而兩岸政治正是兩岸關係改善與否最根本的原因。尤其在臺灣民主化後，多元化的發展使兩岸政治關係更趨困難，雙方政治的困境主要反映在對兩岸國家定位認知不同。

在中共方面，中共因應1978年11屆3中全會國家戰略的調整，採取了有別以往以武力解決臺灣問題之和平對臺政策，其內容核心為：「一個中國」、「一國兩制」，將兩岸關係定位為內政問題，以此來處理兩岸分歧，為兩岸政治作定位。對於「一國兩制」，鄧小平在1984年指出：「根據中國自己的實踐，我們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統一問題，這也是一種和平共處……十億人口的大陸堅定不移搞社會主義，臺灣可以搞它的資本主義，這不也是和平共處嗎？所以和平共處的原則不僅在處理國際關係問題上，而且在一個國家處理自己內政

註3 陳春根，蔣思海，〈臺灣：美國亞太地緣戰略的基點〉，《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第23卷第4期(2002年8月)，頁25。

註4 馬紹堯，〈論臺灣問題與國家安全戰略的關係〉，《社科縱橫》，第25卷第4期(2010年4月)，頁85。

註5 劉軻，〈臺灣問題背後的中美戰略博弈〉，《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8卷第4期(2007年12月)，頁15。

註6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58。



問題上，也是一個好辦法。」^{【註6】}

繼任者江澤民在1995年1月發表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時，也明確指出：「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實現和平統一的基礎和前提。」中共國務院於2000年所發表之《一個中國的原則與臺灣問題白皮書》也指出：「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國對臺政策的基石。經由鄧小平的倡導，中國自1979年開始實行和平統一的方針，並逐步形成了「一國兩制」的對臺構想，在此基礎上，確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這一基本方針和有關政策的要點是：爭取和平統一，但是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積極推動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等各項交流，早日實現兩岸直接通郵、通航、通商；通過和平談判實現統一，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什麼都可以談；統一後實行「一國兩制」，中國的主體（中國大陸）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臺灣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統一後臺灣實行高度自治，中央政府不派軍隊和行政人員駐臺；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不需借助外國力量。」^{【註7】}

以往「一個中國」的內涵主要為，世界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然而，隨著國際環境的發展及兩岸關係的轉變，近年來「一個中國」的內涵產生變化，中共十六大賦予了「一個中國」的新內涵，「一個中國」被逐步解釋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註8】}中共的十七大報告更進一步將「一個中國」的內涵周全，提出了：「儘管兩岸尚未統一，但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中國是兩岸同胞的共同家園，兩岸同胞應攜手維護好，建設好我們共同的家園。」^{【註9】}其內涵及文字表述雖有調整，然而，「一個中國」作為中共對臺政策的政治底線仍未改變。

在臺灣方面，於兩岸政治定位上，大致分為兩種立場，主張臺灣獨立為目標的民進黨及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為兩岸政治前提的國民黨。然而，兩黨皆不接受中共所提出的「一個中國、一國兩制」的兩岸政治定位。2008年，政黨輪替後，基於兩岸關係的政治現實，有別於民進黨政府強化主權對抗的作法，馬政府所採取兩岸關係的政治戰略是淡化主權爭議，以追求兩岸的和平及合作。2008年，在馬政府上任前，當時的副總統當選人蕭萬長和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會面時，蕭萬長當場提出「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十六個字。蕭萬長並提出兩岸

註7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一個中國的原則與臺灣問題白皮書〉，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2-11/14/content_630040.htm

註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頁34。

註9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人民日報》，2007年10月25日，版4。



直航由周末包機開始、儘速開放中國大陸觀光客來臺、促進兩岸經貿正常化、恢復兩岸協商機制四項要求。【註10】

馬政府就任後，總統馬英九在國慶談話中，在提及兩岸問題時正式提出：「海基會與海協會應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重啟中斷十年的協商，化解兩岸對立情勢，開創和平新局，穩定東亞局勢，贏得國際社會肯定。我們秉持「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原則，在開放鬆綁的政策指導下，逐步推動包機直航、陸客來臺觀光、小三通擴大以及臺商回臺上市等，為海峽兩岸開創一個開放而穩定的新局。」^{【註11】}希望藉由政治爭議的擱置，共創兩岸雙贏的發展。當前臺灣的大陸政策雖然對改善兩岸氣氛及雙方合作有所助益，然而對兩岸的政治僵局仍然無解。

兩岸關係的發展除了涉及當事國外，由於深具地緣戰略價值，因此外部因素對兩岸關係的發展甚為重要，其中以美日兩國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最為關切。就美國來說，早在1853年美海軍准將培里(Matthew C. Perry)就看到了臺灣對美國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曾提出：「美國要在亞洲有所作為，必先控制臺灣。」而當代美國戰略家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也說：「美國不能放棄臺灣不是為了一個分離的臺灣，而是為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利益。」遠東美軍總司令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更將臺灣比作「不沉的航空母艦和潛艇補給艦」，誰掌握了臺灣島，就能有效地控制東海至南海間的咽喉要道，也有了通往「第二島鏈」內海域的有利航道及走向遠洋的便捷之路。^{【註12】}另從非軍事的角度看，臺灣經濟的成功與政治民主化的發展，被美國視為亞太的民主櫥窗，是美國對中共推動和平演變的前沿。加強與臺灣政治、軍事安全關係，是美國鞏固亞太地區主導地位、實施歐亞地緣戰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美國在發展美中關係時制衡中共的一個重要籌碼。對美國來說，利用兩岸關係的矛盾，以對中共產生制衡的戰略效果，在美國實施全球戰略上有其特殊的意義。^{【註13】}

當前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選項大致可歸納四種形式：一、繼續堅持「一個中國，和平解決」方針，繼續以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為指導原則和臺灣關係法作為對臺政策框架。二、放棄「一中原則」，鑒於中國大陸迅速發展，中共國家實力的提升。

註10 〈綠營：蕭胡會擱置主權爭議 恐埋未來障礙〉，<http://n.yam.com/cna/politics/200804/20080413037218.html>

註11 〈總統主持中華民國建國97年國慶典禮〉，總統府，http://www.president.gov.tw/php-bin/prez/shownews.php4?_section=3&_recNo=48

註12 侯瑞雪，張蒙，〈透視中美博弈下的臺灣問題〉，《山西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研究生論文專刊》，第22卷(2008年3月)，頁93。

註13 李振廣，〈臺灣地緣戰略地位的形成與變遷〉，《國際政治研究》，2001年第4期，頁124。



美國擔憂中共會挑戰其全球霸主地位，借支持臺灣民主為口實，重新回到中美建交前的對臺政策上去，全面支持臺灣獨立。其結果將導致中美關係的全面倒退、甚至引發戰爭。三、美國仍然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在保持現狀的前提下，做出技術和策略調整。如積極扶持臺灣的民主體制、強化與臺灣的政治、軍事關係，重新審議美國國務院在1979年至1980年間制定的規範美臺之間往來的臺灣事務指導原則，在海峽兩岸的互動中扮演更加主動的角色等。換句話說，美國積極介入臺海事務，盡可能的拖延兩岸的統一，以維持海峽兩岸的現狀，滯後中共的崛起。四、鑒於臺獨勢力的一意孤行，不顧美國的反對，堅決要求獨立。為避免捲入戰爭，美國宣佈放棄與臺灣關係法，支持中共對臺灣的統一。^{【註14】}基本上，美國當前或未來，除非遇到不可預期的國際變局，美國在兩岸關係的立場與作法，應會採取第一及第三選項，以保持兩岸問題上的戰略彈性。

就日本來說，日本把臺灣稱之為「東方的直布羅陀(Gibraltar)」，此話正適切的反映了臺灣對於日本的重要性，在對缺乏資源的島國條件下臺灣地位更顯重要。在地緣政治的角度下，臺灣對日本的重要性甚至超過美國。主要在於臺灣扼制日本生命線之要衝，是其南下東南亞、伸入波斯灣，西去歐洲的必經之道。日本每年在這條航線上的運輸量達5億噸，其中包括日本所需石油的90%和核燃料的100%。日本人認為，臺灣如被日本以外(尤其是中共)的國家控制，就等於給日本人的脖子上套上了一條可以隨時勒緊的繩索。^{【註15】}在中共綜合國力不斷提升的情況下，對日本來說，臺灣的控制與歸屬更顯敏感。

在地緣因素下，位於中國大陸近鄰的日本，早已認識到臺灣的戰略價值。1868年，日本在明治維新後，迅速走上了侵略擴張的道路，臺灣成為首當其衝的目標。1894年，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戰爭，其重要的意圖之一便是攫取臺灣，以便作南進的戰略部署。日本前首相松方正義當時就毫不掩飾的說：「臺灣非永久歸我國不可」，「臺灣之於我國，正如南門之鎖鑰，如欲向南發展，以擴大日本帝國之版圖，非闖過此一門戶不可。」^{【註16】}即使現在此種看法仍未改變，2001年2月，日本出版了一本書名為《東亞的火藥庫：中臺關係與日本》的著作。在這本書中，作者就提出相似的看法，文中指出：「如果中共在臺灣行使主權，不僅在中臺之間，那些與臺灣有著利害關係的國家將也會與中共產生糾紛。而毫無疑問，日本就屬於對中臺關係極為密切的國家。因為，由中東向日本運送原油的運輸線要經過臺灣海峽，臺灣

註14 巴殿君，〈21世紀中美雙邊關係中的臺灣問題〉，《東北亞論壇》，第16卷第5期(2007年9月)，頁69-70。

註15 孫云，〈試析兩岸關係中的日本因素〉，《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1年第4期，頁56。

註16 彭謙主編，《猛醒吧，日本》(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頁41-42。



海峽是日本的生命線。從中充分體現了臺灣在當代日本國家對外戰略中的重要地位。」^{【註17】}因此，在兩岸問題上，基於國際現實，日本雖然承認「一個中國」原則，然而，對臺灣內部於未來的發展仍顯示出嚴重關切的態度。

綜合以上所言，近年來，兩岸關係的發展因國際局勢、中共國家戰略佈局及臺灣的大陸政策關係趨於穩定，然而雙方在最敏感的政治問題上仍然無解，兩岸關係的變數仍大。另基於臺灣的戰略價值，兩岸關係的發展除了當事國外，也將觸及區域(日本)與全球(美國)戰略利益的發展。美日因戰略利益的考量，在臺灣的立場上是採取戰略合作的態度，簡言之，日本是在美國亞太戰略的規劃下看兩岸問題。因此就美日的立場看，冷戰結束後，國際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美國政府根據形勢的發展，逐步調整其對華政策和對台政策，以維護其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外交、政治和經濟利益，確保其世界領導者的地位。一方面，隨著90年代以來中共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綜合國力的顯著提高，美國將中共視為其潛在的戰略競爭對手，因此美國希望臺灣問題為手段，作為遏制中共的崛起的籌碼。另一方面，中共在國際社會中已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中美間的共同利益也在逐步增加，因此美國在處理許多國際事務時都需要中共的支援和贊同。這兩方面相互矛盾的考量即導致了冷戰後美國對臺政策的兩面特徵，它既希望保持中美關係和兩岸關係的穩定，但又以統獨作平衡的槓桿等距操作，達到維持臺海現狀，從而在兩國三邊關係中達到謀取最大主動和利益的目的。^{【註18】}在兩岸雙方政治未定及中美日三國戰略矛盾的結構下，兩岸關係的發展仍隱藏危機，也為中共尋求和平的對外政策埋下不可預知的變數。

參、領土主權的爭議

一般說來，領土主權所延伸的邊界問題往往包含複雜的政治背景和歷史背景，既關係到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也關係到外交政策和周邊環境。因此，邊界問題在鄰國間的互動關係是十分敏感與重要。一方面，兩國關係的好壞直接決定著邊界問題的解決進程；另一方面，邊界問題本身又反過來影響著兩國關係的發展。因此，邊界問題是處理相鄰國家關係的關鍵因素。^{【註19】}另外，從邊界的軍事與戰略功能看，邊界是決定一國擁有天然防禦屏障的主要依據，也決定著一國包括海洋的軍事戰略通道。而且，如果一國幅員遼闊，邊界被廣泛劃定，則邊界在某種程度上與該

註17 丸山勝、山本勳，《東亞的火藥庫：中臺關係與日本》（日本：藤原書店，2001年），頁257-259。

註18 孟雪，〈論冷戰結束後中美在臺灣問題上的政策博弈〉，《知識經濟》，2010年第6期，頁179。

註19 吳觀宇，〈和諧世界視野下妥善解決邊界問題的實踐探索〉，《湖南行政學院學報（雙月刊）》，總第51期（2008年6月），頁93。



國的生產能力、自給自足能力和縱深防禦能力息息相關。【註20】對於中共來說，領土主權的爭議因歷史(百年屈辱)而起，主權問題不但牽扯到國家的利益，也象徵重返榮耀的歷史使命。因此中共自建政以來，幾場戰爭幾與主權爭議有關。

1978年後，配合國家戰略的改變，中共對主權問題的處理發生調整，不再以武力作為主要的解決手段。為了解決自身與周邊一些國家的領土爭議，鄧小平依據「新問題就得用新辦法」戰略原則，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辦法。這樣即可以避免戰爭影響周邊穩定，又可以資源分享，共同發展。基於此種戰略思維，鄧小平於1984年2月指出：「有些國際上的領土爭端，可以先不談主權，先進行共同開發。這樣的問題，要從尊重現實出發，找出新的路子來解決。」【註21】在擁有遼闊的陸疆和海疆情況下，中共鄰國眾多，邊界問題也極其複雜。迄今為止，與所有相鄰國家在邊界問題的解決進度上情況各異。大致已成功解決了和俄羅斯、中亞國家以及越南的陸地邊界問題，但是仍然有部分領土劃界沒有定論，解決進程緩慢，困難重重，在陸地上主要是與印度的邊界問題，在海洋上則表現在與日本的釣魚臺以及與東南亞部分國家之南海問題的爭議上。中共與周邊國家的邊界問題是否能妥善解決，直接關係著東亞地區的穩定。【註22】

在印度方面，中共與南亞諸國存在著大小不等的邊界問題，然而除了與印度之外，大致上都已獲得解決。如中共與阿富汗已在1963年11月22日達成了邊界協議，並於1965年3月24日正式勘定了兩國的邊界，使中阿兩國92公里長的邊界成為無爭議邊界；中共與尼泊爾兩國也在1961年10月簽訂了《中尼邊界條約》，解決了兩國的邊界問題；而中共與巴基斯坦的邊界也早在1963年獲得解決。【註23】目前只剩與印度在邊界問題上仍有爭議，是中共目前存在領土爭議面積最大的周邊國家，兩國共有2000公里長的邊界線，分東、中、西三段。其中，爭議最大的是東段「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以南地區和西段「阿克賽欽」(Aksai Chin)地區，雙方爭議面積共計12.5萬平方公里。【註24】

中印邊界問題，早在1950年代初兩國便發生歧見，不過當時雙方並未因而引起衝突。然而自從中共佔領西藏，把勢力推向接近與印度為鄰的麥克馬洪線後，西藏原本作為兩國緩衝地區的功能消失，使得中印邊界爭議更為尖銳，【註25】雙方還因

註20 Robert Strausz-Hup, *Geopolitics: The Struggle for Space and Power* (New York: G. P. Putnam and Sons, 1942), p. 191.

註21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頁49。

註22 段宇宏，〈邊界衝突困擾中國〉，《報刊薈萃》，2008年第11期，頁5。

註23 唐家璇主編，〈中國阿富汗邊界協定書〉，《中國外交辭典》(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頁462；唐家璇主編，〈中國尼泊爾邊界條約〉，頁497；唐家璇主編，〈中國巴基斯坦邊界協定書〉，頁464。

註24 唐家璇主編，〈中印邊界問題〉，頁739-740。



此於1962發生邊界軍事衝突。印度對西藏問題的介入，主要是繼承了英印政府「戰略邊界」的思想，認為確保其北部邊境安全最經濟辦法就是把西藏變為「緩衝區」，讓中、印兩國脫離接觸。然而，當1950年中共進入西藏後，印度的「西藏緩衝區」目標消失，衝擊到印度成為南亞大陸區域霸權的戰略目標。印度的國家安全概念分南北兩面，在北面印度要求要巴基斯坦—西藏—孟加拉一線擁有實際控制能力，南面印度則要求對印度洋的實際控制能力。要實現此目標，就不能迴避北方中共所產生的地緣威脅，藉由促成西藏與中共分裂可作為解除此一威脅最根本的途徑。西藏所形成中印緩衝區的存在，可使印度在避免腹背夾擊的條件下，在南亞大陸繼而在印度洋地區採取更為大膽的行動。【註26】

雙方的敵對關係，隨著國際局勢發展而有所改變，在經濟合作逐漸取代軍事對抗的情勢下，中印兩國基於國家整體的發展，在各方面展開合作。2003年雙方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宣言》，文中印度明確承認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重申不允許西藏人在印度進行反對中共的政治活動。這份宣言第一次以官方檔的形式確認了中共對藏的主權，象徵著印度正式承認西藏是中共領土的一部分，放棄了以前認為中共對西藏僅享有宗主權或西藏為自治區的立場。【註27】另外，中印在邊界問題上也展開多回合的談判工作，在某種程度上取得一定的進展。然而，由於中印之間2000多公里的邊界線從未正式劃定過，爭議領土面積達12.5萬平方公里，涉及範圍之大，情況之複雜在當今大國關係中絕無僅有，尤其是東段的9萬多平方公里，成為爭議的核心焦點。儘管中印雙方正在探討解決邊界問題的政治框架，但對實際控制線、傳統習慣線以及麥克馬洪線的認識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達成雙方認同的框架協定難度仍非常大。【註28】另外，雖然中印關係逐漸走向和解，然而先天的權力矛盾，仍使中印雙方在主權紛爭與國家利益上衝突不斷，就權力政治的角度看，很難達成真正的和解。

在南海主權爭議方面，南海諸島分佈在中國大陸的海南島以南和以東的南中國海上，按其分佈形勢，分為四大群島，即東沙群島、中沙群島、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當前所謂的「南海主權爭端」，主要是指南沙群島的爭端，南沙群島位於北緯3度37分至11度55分，東經109度43分至117度47分，南北長約550浬，東西寬約650浬的海域，總面積約65萬平方公里；西起萬安灘，東至海馬灘，北至雄南灘，南至

註25 張虎，《剖析中共對外戰爭》（臺北：幼獅出版社，1996年），頁89。

註26 張文木，《中國新世紀安全戰略》（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92。

註27 衛靈，《冷戰後中印關係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95-196

註28 李斯，〈後冷戰時期的中印巴三角關係〉，《江南社會學院學報》，第10卷第1期（2008年6月），頁50。



表一 南沙群島駐軍現狀

國家	佔領島礁	駐軍狀況
中共	永暑礁、美濟礁、渚碧礁、南熏礁、東門礁、赤瓜礁、華陽礁 7 個島礁	1988 年初，組織有關人員進駐永暑礁建立海洋觀測站，此後為了守衛和建設這些島礁，海軍建立了「南沙巡防區」，以定期輪換方式駐守。
臺灣	太平島	海岸巡防署在太平島設立了南沙指揮部，總兵力約 110 人，下轄的岸巡中隊戰時根據命令納入臺灣軍事作戰體系，遂行各項作戰和支援任務。
越南	南威島、鴻麻島等 29 個島礁	駐軍約 2 千人，指揮部設在南威島，目前，越南在南沙駐軍最多。
菲律賓	馬歡島、費信島、中業島、司令礁等 9 個島礁	1948 年開始，菲律賓多次組織「探險隊」、「遠征隊」於南沙群島進行偵察勘測活動。1970 年，派軍佔領島礁，現駐軍約 100 人，指揮部設在中業島。
馬來西亞	彈丸礁、光星仔礁、南海礁等 5 個礁灘	1970 年，馬來西亞開始於南沙群島南部海區進行鑽探活動。1977 年開始派艦船佔領南沙群島南部海區，現駐軍 120 多人，指揮部設在彈丸礁。

資料來源：〈南沙群島駐軍現狀〉，《大公報》，2009年3月7日，版A12。

曾母暗沙；共有230多個島嶼、沙洲和礁灘，其中有11個島嶼，5個沙洲，20個礁是露出水面的。在戰略上，南沙群島地處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的咽喉，扼守兩洋海運的要衝，是多條國際海運線和航空運輸線的必經之地，也是扼守麻六甲海峽、巴士海峽(Bashi Channel)、巴林塘海峽(Balintang Channel)、巴拉巴克海峽(Balabac Strait)的關鍵所在，是中共南方海防前哨，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註29】}另外，它不僅是西方尤其是日本海上運輸石油等戰略資源的必經之路，也是美國海軍從西太平洋進入印度洋的主要通道。^{【註30】}

目前南海問題爭議國有中共、臺灣、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及汶萊六國。所謂「南海主權爭端」，正如上文所提，主要指南沙群島的爭端。西方通稱斯普拉特利群島(Spratly Islands)由230多個珊瑚島礁組成，是南海諸島中面積最大、資源最豐富，目前除了汶萊外，其於五國在南沙群島各有駐軍(如表一所示)。基於戰略的考量，除了當事國外，南海問題也有以美國為首之外部因素介入。基本上，在南海問題，大致存在著三種力量主體和兩種性質的矛盾。三種力量主體一個是中共，另一個是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等力量主體，第三個則是以美國為首的外部力量；兩種性質的矛盾，即中共和周邊國家圍繞南海資源、主權之間的矛盾，中共和美國等國家以南海問題為矛盾點的國際較量，包括國際航線、國家發展戰略、國際地位、國際海權、中共崛起等。在這些力量和矛盾共同作用下，南海問題不太

註29 葛勇平，〈南沙群島主權爭端及中國對策分析〉，《太平洋學報》，2009年第9期，頁72。

註30 劉淑梅，〈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及戰略對策〉，《蘭州學刊》，總第157期(2006年10月)，頁103。



可能會激化但會長期存在。三種力量形成相互制約的均衡態勢，南海問題的現狀就是這種力量均勢格局的體現。【註31】

中共在南海問題的立場上，配合改革開放的國家戰略，採取「主權擱置、共同開發」的立場，鄧小平在1984年10月就明確指出：「南沙群島，歷來世界地圖是劃到中國的，屬中國，現在除臺灣佔了一個島以外，菲律賓佔了幾個島，越南佔據了幾個島，馬來西亞佔了幾個島。將來怎麼辦？一個辦法是我們用武力統統把這些島收回來；一個辦法是把主權問題擱置起來，共同開發，這就可以消除多年來積累下來的問題。」【註32】1988年5月12日，中共外交部發表的《關於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備忘錄》指出：「中國一貫主張和平解決國與國之間的爭端，在南沙問題上也是如此。正是本著這種精神，中國主張將南沙群島問題暫時擱置一下，將來商量解決。」【註33】2007年10月15日胡錦濤主席在中共第17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所有國家發展友好合作。……我們將繼續貫徹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加強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和務實合作，積極開展區域合作，共同營造和平穩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贏的地區環境。」【註34】象徵和平發展，共同合作仍是當前中共國家戰略的主軸，在南海問題上，「主權擱置、共同開發」的原則仍將不變，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對南海問題希望藉由雙方談判的形式進行，反對南海問題國際化，以防止外國勢力介入。

東南亞國家於南海問題的立場上，在東協涉及南海問題的國家中，對於主權爭議互有立場各有堅持，然1990年代以來，東協開始積極協調各成員國在南海爭端問題上的立場，逐漸形成了東協針對南海問題的共同立場。1992年7月22日第25屆東協外長會議首次將安全問題列入議題，南海問題成為東協安全的重要內容，會議通過了《東協關於南海問題的宣言》，強調必須用和平的手段而不訴諸武力解決同南海有關的一切主權和管轄權問題，建議有關各方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原則作為制定南海國際行為準則的基礎。【註35】東協在該《宣言》中表達了解決南海問題的五點基本立場：一、以和平手段解決南海主權和管轄權爭端，不訴諸武力；二、敦促有關各方自我克制，創造良好氣氛來解決爭端；三、在不損害在該地區有直

註31 陶連洲，〈矛盾與選擇：中國崛起背景下的南海問題〉，《湖南工程學院學報》，第20卷第4期（2010年12月），頁75。

註32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87頁。

註33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表關於西沙、南沙群島問題的備忘錄〉，《人民日報》，1988年5月12日，版4。

註34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版4。

註35 成雪峰，〈試論東盟對建立亞太安全體制的影響〉，《國際政治》（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2001年第5期，頁13。



接利益的國家主權和管轄權情況下商討各方就該地區的航行、交通安全、保護海洋環境、對付海盜、販毒、走私等方面進行合作的可能性；四、邀請有關各方簽署該宣言。【註36】

雖然中共與東南亞介入南海主權各國，對於南海問題以採取和平解決的方式皆有共識，然而，因所牽扯利益及矛盾錯綜複雜，南海問題仍是東南亞區域最具衝突的引爆點。冷戰時期中共與越南曾於1974、1988年分別於西沙與南沙群島發生軍事衝突，冷戰結束後，中共與菲律賓也曾於1995年在美濟礁發生紛爭。除了以上的紛爭外，在南海問題上，仍持續發生零星的小衝突。此外，東南亞各國也因在南海各有利益及戰略盤算時有紛爭，2011年6月，南海爭端再起，越南外交部發言人阮芳娥發表聲明稱，維持南海的和平、穩定、安全是「該地區內國家以及該地區以外國家的共同利益」，國際社會為維持南海和平穩定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值得歡迎，間接向美國等介入招手。直接挑戰中共一直堅持南海問題應由爭議雙方協商解決，反對外力介入的立場。菲律賓也宣佈，將南海改稱「西菲律賓海」，對南海問題展示強硬姿態。【註37】

在南海問題上，對於外國勢力的介入，一向被中共視為對主權的侵犯，然而，基於南海的戰略價值，如印度、日本、美國等國對於南海問題皆表關切，如印度就對東南亞非常感興趣，為了實現其區域霸權的戰略目標，近年來開始介入南海爭端，與越南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同時還加強了與印尼、馬來西亞等國的軍事聯繫。【註38】另外南海除了是日本對外重要的戰略航道外，在與中共於東海存在島嶼、大陸架和油氣資源爭議的戰略考量下，希望在南海問題上與東協國家聯合起來，採取一致行動對抗中共，藉此換取東協國家在東海問題上的支持，實現限華、制華的戰略目標。【註39】而美國對南海問題的發展更是舉足輕重，如中共國家海洋局在《中國海洋發展報告2009》中就分析到：「南海形式複雜多變，南沙群島的安全問題尤為突出，中共與東南亞國家的南海之爭，表面上看是島礁之爭，實質是資源之爭。在中共和平發展過程中，美國肯定不會坐等中共的崛起而無動於衷，而中共與東南亞國家在南海問題上矛盾則為美國進一步介入南海問題提供了藉口。」【註40】外力的介入與深具地緣戰略價值，加以南海蘊藏豐富的石油與漁獲，皆使南海問題趨於複雜，也使南海成為潛在的衝突地區。

註36 柯山，〈東盟國家的安全合作及其影響〉，《南洋問題研究》，2002年第2期。

註37 〈越歡迎美介入海域糾紛菲律賓將南海改名〉，《南洋商報（馬來西亞）》，2011年6月14日，版A26。

註38 褚浩，〈南海問題的新形勢與新發展〉，《國際資料資訊》，2010年第12期，頁42。

註39 李金明，〈南海問題的最新動態與發展趨勢〉，《東南亞研究》，2010年第1期，頁39。

註40 陶連洲，〈矛盾與選擇：中國崛起背景下的南海問題〉，頁76。



在釣魚臺主權爭議方面，釣魚臺列嶼(日稱尖閣群島)是一群無人居住的小島，位於臺灣基隆東北約100公里處，散佈在北緯26度至25度40分，東經123度至124度34分之間。該列嶼共由8個小島組成，分別為釣魚島、飛瀨島、北小島、南小島、大北小島、大南小島、黃尾嶼(日稱久場島)及赤尾嶼(日稱大正島)，其中以釣魚島最大，面積約為4.319平方公里。^{【註41】}1990年代發現石油資源之前，對於釣魚臺列嶼的歸屬，中日之間並未發生什麼爭議，雙方對在列嶼附近海域的漁獵活動也基本持默認態度。然而，從1968年起，不斷傳聞釣魚臺列嶼附近蘊藏著豐富的石油資源。1969年10月，聯合國亞洲經濟開發委員會(ECAFE)在曼谷正式發表調查報告，明白指出，東海、黃海海域和中國大陸礁層下的沉積岩中，蘊藏著儲量豐富的大油田；尤其是臺灣東北方釣魚臺列嶼周邊，約有20萬平方公里的海底油田，所蘊藏的石油，將來可望成為世界有數的產油區之一，^{【註42】}引發中日兩國對釣魚臺主權歸屬問題的爭議。

就日本來說，其對釣魚臺的基本見解為：「自1885年以來，日本政府通過沖繩縣當局等途徑再三實地調查，慎重確認尖閣諸島不僅為無人島，而且沒有受到清朝統治的痕跡。在此基礎上，於1895年1月14日，在內閣會議上決定在島上建立標樁，以正式列入我國領土。」^{【註43】}認定以無地主先佔的法理取得主權，主張釣魚臺屬於日本的領土。1971年6月17日，美日簽署歸還沖繩協定—《關於琉球諸島及大東諸島的美日協定》，也將釣魚臺劃入歸還沖繩的區域內，^{【註44】}目前日本實質佔有釣魚臺。而中共則認為，在18世紀以前，15至16世紀，國際法上是「發現即領有」的時代。中國早在明朝時已有歷史記載中國人利用釣魚島赴琉球的文獻，此文獻即是1403年《順風相送》一書。書中記載的名稱為釣魚嶼和赤坎嶼，即今天的釣魚臺、赤尾嶼，後續仍有記載釣魚臺的歷史文獻，足以證明釣魚臺自古為中國領土，因此認定擁有釣魚臺主權。^{【註45】}

對於釣魚臺主權之爭，中共與南海問題一樣，基於整體國家發展的考量，採取「主權擱置、共同開發」的立場。如1974年10月3日，時任中共副總理的鄧小平，

註41 張植榮主編，《中日關係與釣魚臺問題研究論集》(香港：勵志出版社，1999年)，頁237。

註42 張植榮、蔣蘇晉，〈美國與中日釣魚臺列嶼爭端〉，《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12卷第3期(2002年9月)，頁93。

註43 日本外務省中國課(處)監修，《日中關係基本資料集1970-1992》(東京：東京財團法人霞山會發行，1993年11月20日)，頁73。中文版見日本國駐中國大使館網站。轉引自劉江永，〈論中日釣魚島主權爭議問題〉，《太平洋學報》，第19卷第3期(2011年3月)，頁72。

註44 劉江永，〈中日釣魚島之爭中的美國因素〉，《世界知識》，2011年第9期，頁24-25。

註45 鄭海麟，〈《順風相送》所載釣魚臺列嶼史實考釋〉，《釣魚臺列嶼之歷史與法理研究》(香港：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頁14-27。



在會見日中友好協會代表團、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代表團時，首次向日方提出：「為早日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還是擱置釣魚島主權問題為好。」^{【註46】}1978年8月10日，雙方就《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談判基本達成共識後，鄧小平副總理會見園田直外相時，雙方談到釣魚島問題時重申：「這種問題可以把它放一放，我們這一代人找不到解決的辦法，我們的下一代，再下一代總會找到辦法解決的。」^{【註47】}

即使如此，中日在釣魚臺問題上仍時常出現紛爭，近年來，由於中共的崛起，基於戰略考量，美國開始將釣魚臺劃入美日戰略合作的範圍內。如2000年10月，美國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發表題為《美國與日本一走向成熟的夥伴關係》(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dvancing Toward a Mature Partnership)的報告。該報告稱，美國要使美英特殊關係成為美日同盟的樣板，「美國必須就包括釣魚島在內的日本行政統治之下的地區，向日本重申自己的防務承諾」。主持完成這份報告的阿米塔吉(Richard Lee Armitage)於2001年出任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主管亞太事務的副國務卿，這份報告的建議也開始變為美國政府的政策。2001年12月12日美國助理國務卿福特(Carl Ford)表示：「釣魚島一旦受到攻擊，美國有可能對日本提供支持。」^{【註48】}

2004年3月，美國更明確提出關於釣魚臺問題的三段論：一、釣魚臺列嶼屬日本政府管轄；二、《美日安保條約》第5條明定，該條約適用於所有日本管轄領土；三、因此，《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臺列嶼。^{【註49】}直至現在，美國對釣魚臺仍持此種立場。如去年2010年9月，美國白宮國安會亞太資深主任貝德(Jeff Bader)指出：「美國對中日主權爭議不採取立場，但美日安保條約適用範圍確實及於所有受日本行政管轄的地區，釣魚臺列嶼自1972年即受到日本行政管轄，這是美方長久以來的一貫立場。」^{【註50】}另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2010年11月於越南參加東南亞國協高峰會暨東亞高峰會時也表示：「美國願在中日釣魚臺爭端扮演調人。尖閣諸島(釣魚臺)適用《美日安全保障條約》第五條規定。」^{【註51】}顯現出美國基於整體東亞戰略布局的考量，對中日釣魚臺之爭採取積極介入的立場。

從鴉片戰爭以來，近百年中國受到西方的屈辱，「百年屈辱」影響到中共對領

註46 劉江永，〈論中日釣魚島主權爭議問題〉，《太平洋學報》，第19卷 第3期(2011年3月)，頁85。

註47 張香山，〈中日關係管窺與見證〉(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頁91。

註48 劉永江，〈中日釣魚島之爭中的美國因素〉，頁25。

註49 〈美承認《美日安保》含釣魚臺〉，《蘋果日報》，2010年8月18日，版A20。

註50 〈白宮呼應希拉蕊 美日安保條約 適用釣魚臺〉，《自由時報》，2010年9月25日，版A4。

註51 〈美國強勢介入亞太和中國較量龍頭地位〉，《中華日報》，2010年11月4日，版A2。



土主權的態度，使得中共在此議題除了戰略考量外，也兼負恢復以往光輝中華的歷史使命。因此自中共1949年建政以來，在處理領土主權的態度皆十分強硬，改革開放以前，多次與周邊國家因主權問題發生軍事衝突，如珍寶島衝突、中印戰爭、與越南在南沙與西沙的海戰等，這些事件皆顯現中共捍衛主權的強硬態度。1979年後，雖然因國家戰略的改變而對主權問題採取較為和平的處理方式，然而主權問題仍常挑起中共的政治敏感神經，也發生幾次擦槍走火的衝突事件，如1995年與菲律賓因南沙主權在美濟礁發生海戰；2001年中美軍機擦撞等，皆因主權問題而起，可以說，在中共和平外交政策的原則下，主權問題仍是最敏感及不穩定的因素。

肆、中國威脅論

「中國威脅論」最早出現在1990年代初的日本學界，日本防衛大學的學者村井有秀，他於1990年8月發表了一篇《論中共這個潛在的威脅》的文章，從綜合國力和長遠發展的角度把中共視為一個潛在的敵人，【註52】至此「中國威脅論」不逕而走。有學者整理了1990年代以來「中國威脅論」的發展脈絡，指出「中國威脅論」的第一波是在1992-1993年間，主要從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及文明角度展開對「中國威脅」的具體論證；第二波是在1995-1996年間，起因是臺海危機以及由此引起的美國國內對華政策的大辯論；第三波出現在1998-1999年間，美國政府製造了「李文和案」、「政治獻金案」，指控中共竊取美尖端技術、「威脅美國家安全」等成為「中國威脅論」的主要內容；第四波開始於2007年，美國以中共進行太空實驗大肆宣揚「中國軍事威脅論」。【註53】

「中國威脅論」的理論依據來自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政治乃是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與國內政治最大的差異即是沒有一個高於各主權國家的中央政府來管理國際事務，因此國家成為單一行為體並會出於理性考量而追求權力，以達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註54】其中，正在衰退與正在崛起中國家間發展的差異比率，則會造成國際間權力的重新分配與國際體系的不平衡。【註55】換言之，一個崛起的大國遲早要挑戰霸權國和現有國際秩序，甚至很可能為此發動戰

註52 王金亮、呂慶廣，〈理性解讀「中國威脅論」基於中國和平崛起的視角〉，《濮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22卷第1期（2009年2月），頁36。

註53 周琦、彭震，〈“中國威脅論”成因探析〉，《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3卷第3期（2009年5月），頁130。

註54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8), p. 29.

註55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Press, 1981), p. 185.



爭。【註56】因此，崛起的中共絕不可能維持現狀，凡是崛起的國家必然是體系的挑戰國，而不可能是現狀國家。處在權力轉移中的霸權國家和崛起國家最容易因崛起國家對自身地位的不滿而走向戰爭。【註57】以此推之，霸權追求是中共參與國際體系的動力，而與美國爭霸是中共與國際體系關係的本質特徵。【註58】

冷戰結束後，蘇聯瓦解，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是國際制度和規則的制定者、議程的設置者、國際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可以說美國是當今國際體系中的「霸權國家」。根據國際關係理論和歷史的邏輯，處於霸權地位的國家一般都是維持現狀國家，在它獲得霸權以後，它會設法保持自己的地位，維護既得利益，阻止新興大國的崛起和修正主義國家向國際秩序發起的挑戰。【註59】而中共在戰略上居於亞太地緣格局的中心位置，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不論中共的主觀意志如何，中共的崛起，必然要引起本地區以至世界格局和大國體系的結構性變化，導致國際政治權力的重新配置。【註60】

中共的崛起主要反映在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的驚人成就，2010年，已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經濟規模未來極有可能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如2003年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的一篇分析即認為，中共經濟規模可能在2041年超過美國。【註61】另學者奎士托福(Nicholas D. Kristof)也指出，以中共經濟成長的速度來看，它在21世紀中葉前的經濟就會超越美國而躍居世界第一。【註62】中國大陸清華大學在為題《上升中的中國國力與國際地位與作用》報告中指出，中共經濟高速發展可持續二、三十年時間，經濟總量大約在2035年左右可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註63】

除了經濟威脅外，中共的軍事與政治也將對世界產生威脅。在「軍事威脅論」方面。其論點為：中共經濟實力增長將導致軍備擴張，最後將威脅其他國家。其主觀判斷是：中共經濟持續發展為軍事開支提供保證；中共軍力「擴張」超出防衛需

註56 A. F. K. Organski and Jacet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註57 Ibid., pp. 22-27.

註58 John J. Mearsheimer, "China's Unpeaceful Rise," *Current History*, vol. 105, no. 690 (April 2006), pp. 160-162.

註59 張燕軍，〈大國協作、共同安全—東北亞安全合作模式的探索—及與均勢、霸權穩定模式的比較分析〉，《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3期(2009年5月)，頁355。

註60 趙海月，〈中國地緣政治環境與中國戰略安全分析〉，《學習與探索》，總第165期(2006年8月)，頁16。

註61 Dominic Wilson and Roopa Purushothaman, *Dreaming with BRICs: The Path to 2050* (N.Y.: Goldman Sachs Global Research Center, Global Economics Paper No. 99, October 2003), p. 3.

註62 Nicholas D. Kristof,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5 (November/December 1993), pp. 59-74.

註63 〈清華版國力報告26年後超美中國GDP一哥〉，《中國時報》，2009年7月16日，版A15。



要；中共有可能採取軍事手段解決同周邊國家的領土、領海等邊界爭端；軍力增加的中共將越來越傾向於在國際事務中使用武力；中共武器出口在國際上造成威脅。

【註64】在「政治威脅論」方面，其論點為：來自中共政治上的威脅性不僅在於「它將崛起為世界大國，更主要的是它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是地球上最後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中共的價值觀仍然與西方的價值觀相敵對，意味著中共必然會對資本主義的民主、人權、平等和自由價值觀念構成挑戰和形成威脅。【註65】

美國軍方和其他保守派勢力一直以現實主義為理論依據，相信國家間政治的本質是以實力爭奪權力和利益，尤其倚重軍事實力的作用。他們以一戰、二戰期間德日等崛起大國先後以武力挑戰英美等霸權國家為歷史借鑒，認為中共崛起必將危及美在亞太乃至全球的霸主地位，「大國的悲劇」將再次重演。因此，主張美國等國家應早做準備，通過鞏固美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深化美日等地區軍事聯盟等手段對中共加以「圍堵」。經濟強大導致政治崛起，最後走向軍事擴張，這就是信奉現實主義理論的西方國家對歷史的總結，也是以此預測中共崛起的前景以及中西關係前景的指導原則。【註66】

冷戰結束初期，布里斯辛基所著之《大棋盤》(The Grand Chessboard)堪稱此種論點的代表性著作，此書從地緣政治之權力角度，來分析冷戰後的國際局勢。書中指出，冷戰結束後，雖然沒有一個能威脅美國世界首要大國地位的現實敵人，卻出現了一系列潛在挑戰者。而且由於美國國力及地緣的侷限性，要想長久穩定地保持美國的全球地位，就必須確保對歐亞大陸的控制。並抑制歐亞大陸形成任何足以與美國抗衡的霸權。書中並於第一章新型霸權(Hegemony of a New Type)中分析了中華帝國及蒙古帝國的發展；第六章遠東之錨(The Far Eastern Anchor)中指出亞洲是世界經濟中心也是潛伏的政治火山，中共的崛起將不只成為遠東主導國家，也將是第一流的世界大國。【註67】

另外，1997年孟儒(Ross H. Munro)和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所撰的《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也是論述「中國威脅論」的指標性著作。在書中，他們明確將中共定位為美國最大的潛在敵人與威脅者。

【註68】隨著中共迅速發展，在地區和世界事務中的影響越來越大，「中國威脅論」

註64 馬斌，〈對中國威脅論和責任論的評析〉，《學習月刊》，總第467期，2010年第10期上半月，頁33。

註65 馬建英，〈中國「氣候威脅論」的深層悖論〉，《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9年第3期。

註66 孫敬鑫、于運全，〈近年來中國軍事威脅論出現的背景和原因〉，《大連幹部學刊》，第26卷第12期(2010年12月)，頁47。

註67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p. 30-56.



並未消失，反而更引起了世界的廣泛關注和不同反應。從西方大國崛起的經驗看，大國崛起必然伴隨著戰爭引起國際動盪，以此推論中共崛起必將挑戰現行的國際秩序。陸續又有「環境威脅論」、「產品品質威脅論」等，為「中國威脅論」提供論點支撐。【註69】

冷戰結束後，中共被認定已取代蘇聯成為美國最主要的挑戰者。基此，在軍事上，美國加緊在中共周邊進行戰略部署，通過在該地區重要戰略地點的軍事存在來實現對中共的戰略包圍圈，積極構建對中共具有戰略威懾作用的「島嶼鎖鏈」。因此，冷戰後，美國繼續鞏固以雙邊安全同盟為支柱的「扇形」結構的同盟體系，堅持《美日安保條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美澳新共同防禦公約》、《美泰共同安全法》等雙邊安全條約的有效性，同時，根據全球戰略調整陸續完成了對同盟國的功能重新定位與調整，開始讓同盟國承擔更多責任，擴大同盟合作的領域和範圍，增加同盟合作的方式和手段。這些雙邊性安全安排至今仍是東亞安全結構中最牢固和最持久的構成元素。【註70】通過這一軍事部署，美國不僅可以隨時關注朝鮮半島和臺灣海峽局勢，而且可以在必要時插手南海問題，給中國大陸華南地區和海上交通線的安全構成直接威脅。【註71】

當前，美國正研議將美、日、韓三邊對話機制朝向東北亞安全合作機制(The Security Institution of Northeast Asia)發展，以及建構美、日、澳三邊軍事安全合作進一步整合亞太聯盟體系，希望透過制度化的建構以維持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領導地位，同時遏制中共成為東亞地區的霸權國家。【註72】另外，美國在東亞地區也頻頻與各國展開聯合軍事演習，2010年以來，美國在這亞太地區頻頻進行軍事演習，在強化日韓同盟與美印關係的基礎上拓展與泰國、菲律賓等國的同盟關係，努力使雙邊同盟向三邊和多邊同盟進行有力延伸。為了推進「重返亞洲戰略」，歐巴馬政府還全面參與亞太事務，積極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作為介入中共南

註68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有關中國威脅論另可參考Emma V. Broomfield, "Perceptions of Danger: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2 issue 35 (May 2003), pp. 265-284; Herbert Yee and Ian Storey, *The China Threat Perceptions, Myths and Realit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2); Khalid R. Al-Rodhan, "A Critique of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A Systematic Analysis," *Aisan Perspective*, vol. 31, no. 3 (Fall 2007), pp. 41-66.

註69 劉彥超，〈略論「和諧世界」理念的思想淵源及其意義〉，《中國科技資訊》，2008年12月，頁193。

註70 Victor D.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 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 (Winter 2009/10), p. 158.

註71 龍心剛、梁東興，〈論南海問題中的美國因素〉，《東南亞縱橫》，2010年第9期，頁18。

註72 Sang-Jin Shin, "North Korea-China Relati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East Asian Review*, vol. 17, no. 3 (September 2005), pp. 3-24.



海問題的平台，以遏制中共日益強大的影響力，維持其在亞太地區的優勢和領導力。【註73】基於戰略利益，東亞國家也樂見美國在此區域的實力存在，東亞國家希望借助美國的實力優勢牽制、制衡中共，防止中共將經濟影響力轉化為戰略影響力，損害其戰略利益。正如2009年10月，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公開表示：「歡迎美國在東亞發揮影響力，以平衡中共的地區經濟影響力和潛在的戰略影響。」【註74】

中共的崛起已對國際格局產生結構性的影響，在中共崛起的過程中，以美國為首原有國際主宰勢力，在國際利益上勢必受到挑戰，如以以往的歷史經驗看，最後必將以軍事對抗收場。「中國威脅論」即是在此思維下所產生的論述，在中(挑戰者)美(原霸權)雙方權力競逐的過程中，不論成敗，將成為全球局勢發展的不穩定因素，也將對中共推動和平外政策構成限制與挑戰。

伍、文明衝突與秩序重整

國際環境的變化，往往影響國與國之間交往的模式與手段，也影響國際關係的理論發展，如冷戰時期，在兩極化對抗的國際格局中，現實主義強調軍事對抗的權力視角，正可合理解讀當時的國際現況，使得現實主義成為當時國際關係的主流理論。冷戰結束後，蘇聯解體，歐盟興起，還有一些新興的經濟力量相繼崛起，世界多極化趨勢加速發展。在新的形勢下，國際間實力的資源、性質與範圍也相應發生改變，軍事力量在解決國際爭端中的作用愈顯不力。美國為了繼續保持其霸主地位，逐漸改變了以往軍事為主要手段的戰略，轉而以經濟、外交、科技、文化等非軍事的手段來處理國際事務，以確保自身的戰略利益。【註75】

有別於冷戰時期強調軍事對抗之「硬權力」，後冷戰時期，「軟權力」在國際互動中日益突顯，軟權力的概念與構想最早由奈伊(Joseph S. Nye Jr.)於1990年提出，【註76】2004年出版的著作《軟權力》(Soft Power)一書中，更全面使用了塑造國際規則的提法，他在書中指出：「如果一個國家可使本身的利益和價值觀念與其所塑造的國際規則相吻合，在他人看來，其行為將更具合法性。如果它能使用並遵循那些可引導和限制他國自願行為的制度和規則，它就沒有必要使用相較代價較高的胡蘿蔔與大棒。」【註77】軟權力是指一國的社會意識形態、價值體系、文化主流與

註73 魏向前，〈當前國際安全形勢與中國對外安全選擇〉，《當代世界》，2011年第1期，頁62。

註74 Lee Kuan Yew, "Speech at the US-ASEAN Business Council's 25th Anniversary Gala Dinner," p. 6. http://www.us-asean.org/25_Dinner/MM_Speech.pdf

註75 魏明、龔耘，〈提升文化軟實力：全球化資訊時代中國文化的戰略選擇〉，《安陽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頁19。

註76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vol.80 (Autumn 1990), pp.153-171.



優勢、國民的精神信仰、理想信念、文化道德水準等綜合因素的總和，其範疇包括意識形態和政治價值的吸引力、文化的感召力、國際政治中的結盟能力、利用現有國際組織的能力等。換言之，軟權力是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就當前的國際局勢來說，對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發展與增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註78】

另一個與軟權力具相同概念國際視角是「文明衝突」，哈佛大學教授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於1993年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上發表《文明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一文，在文中，杭亭頓從文明的角度分析冷戰後的國際形勢，並將回教文明與儒教文明視為對以美國為代表之基督教文明的最大挑戰。【註79】此文發表後受到國際學界的熱烈迴響及討論，在根據各方的批評意見後，杭亭頓進一步出版《文明衝突與國際秩序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書，在書中更為全面的將文明間的衝突作更深入的研析，文中尤其強調回教與儒教等文明勢力結合對西方文明的挑戰及威脅，其內容要點為：【註80】

- 一、未來世界的國際衝突的根源將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識形態的和經濟的，全球政治的主要衝突將在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進行，文明的衝突將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間的(在地緣上的)斷裂帶將成為未來的戰線；國際政治的核心部分將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間的相互作用。
- 二、文明衝突是未來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建立在文明基礎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戰爭的最可靠的保證。因此，在不同文明之間，跨越界限非常重要，在不同的文明間，尊重和承認相互的界限同樣非常重要。
- 三、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為界限重新形成，並呈現出多種複雜趨勢：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多極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不同文明間的相對力量及其領導或核心國家正在發生重大轉變，文明間力量的對比會受到重大影響。
- 四、文化，西方文化，是獨特的而非普遍適用的；文化之間或文明之間的衝突，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種文明的衝突，而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對西方文明進行威脅或提出挑戰。

註77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p. 10-11.

註78 秦曉松、左永強、龐豔蘋，〈試從提升軟國力角度分析和諧世界理論的重要意義〉，《科教文匯下旬刊》，2008年第4期，頁198。

註79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Summer 1993), pp. 22-49.

註80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有別於以往權力政治在軍事實力上的側重，「文明衝突論」以文化和文明為出發點，通過文化和文明差異分析國際衝突和戰爭，突出了文化、文明因素在國際局勢中的作用，為國際政治學研究開拓了一個新的領域、新的視角，也促使各國理論界學者和政界精英更加重視文化、文明在世界政治、經濟領域和世界秩序構建中的重要作用。另杭亭頓的「文明的衝突」也引發了一股強勁的「中國文明威脅論」之風，鼓吹者多認為伴隨著中共的大國崛起，國際地位的提高，中華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在全球的流行是對西方文明的嚴重威脅，會衝擊西方的民主、人權、自由等價值觀念。【註81】

由於地緣文明具有顯著的地理性，是在特定空間或區域範圍內的文明或歷史文化的地緣集合體。這些地緣集合體擁有相類似的歷史—文化記憶，分享相似的價值觀、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和語言文化。一個地緣文明一般擁有一個或幾個核心國家，核心國家憑藉其雄厚的政治、經濟、文化能量，把自己周邊的國家或地區凝聚成為一個具有高度集團效能或「合力」的地緣共同體。【註82】如當西方勢力東來之前，在東亞的確存有別於現在西方價值體系之國際秩序，其主導力量的是以中國文化倫理為核心之朝貢國際體制，維持此區域國際秩序長達兩千餘年。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直到17、18世紀，中國在科技、經濟等方面仍處於世界領先水準。甚至鴉片戰爭前的1820年，中國GDP總量佔世界總量的比重還高達32.9%，超過今天美國GDP在世界所佔的比重。【註83】

當中共綜合國力提升到一定程度，的確有可能挑戰當前西方價值的國際體系，而重返以往歷史中國的國際秩序觀。進入新世紀以來，國際社會開始提出「中國模式」、「北京共識」【註84】的概念。2004年4月20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文章指出，經過20多年的改革，中共迅速崛起，這種發展經驗對第三世界國家來說，至少提供了一個有別於西方的發展模式。【註85】中國式以文化(文明)為導向的國際觀已廣泛引起注意。即使如使，中共要在文化面取代美國仍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正如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接受日本朝日新聞訪問時表示：「中共崛起後的所謂「後美

註81 王金亮、呂慶廣，〈理性解讀「中國威脅論」基於中國和平崛起的視角〉，頁37。

註82 阮煒，《地緣文明》(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頁14。

註83 胡鞍鋼，〈對中國之路的初步認識〉，《中國與全球化：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頁148。

註84 喬舒亞·庫珀·雷默(Jooshua Cooper Ramo)提出「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這個概念，指出「中國模式，已開始在經濟、社會以及政治方面改變整個國際發展格局」；相較於繼續倡導旨在保護其自身利益之單邊政策的美國，中共已在許多國際事務領域上削弱美國的影響力。Jo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p. 3.

註85 沈雲鎖、陳先奎，《中國模式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2。



國時代」，或許要等30到50年後才會出現，美國在這段時間依然能對亞太地區發揮影響力。」^{【註86】}然而，仍足以表明中共在文化價值上已對世界秩序的重整產生影響與滲透。

國際責任是全球化時代對世界各主權國家的根本要求，在當今全球化時代，國際社會中的每個成員，無論是國家行為體，還是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等非國家行為體，無論大小強弱都負有一定的責任，對內應提供國內公共物品，如安全、社會穩定、物質保障等；對外應遵守國際規範，維護國際準則，履行國際義務。但是每個國家有大小、貧富、強弱和國家綜合實力的區別，若一國地域廣大，國富民強，在世界經濟、政治中所佔的比重大，那麼相應地它所承擔的責任也更大，也就是說，一國權力的大小與國際責任的輕重應是成正比的。^{【註87】}

近年來，中共也體會到承擔國際責任對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性，尤其在文化的影響力對國際形象的塑造及國際秩序的主導，具有軍事武力所沒有的特點。況且成為一個國際大國，必須有一套文化論述，形成國際主要的文化意識形態，才可說是真正的世界霸主，正如美國在世界的主宰力除了軍事、政治及經濟外，文化的影響力更是無遠弗屆。因此2002年11月，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指出：「文化建設要立足於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著眼於世界文化發展的前沿，發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長處，在內容和形式上積極創新，不斷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吸收力和感召力。」^{【註88】}2003年胡錦濤首次明確提出「確保國家的文化安全」的要求之後，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把文化安全與政治安全、經濟安全和資訊安全，列為國家四大安全。^{【註89】}2005年10月，中共在十六屆五中全會中提出：「加快實施文化產品「走出去」戰略，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註90】}

2007年10月，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力，提高國家文化軟權力。」^{【註91】}2009年7月，中共國務院原則通過了《文化產業振興規劃》。規劃提出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快跨區域重組的振興任務。首次提

註86 〈李光耀：後美國時代再等30年〉，《聯合報》，2010年5月18日，版A13。

註87 任曉，〈研究和理解中國的國際責任〉，《社會科學》，2007年第12期，頁25。

註8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頁30。

註89 姚嘉，〈如何面對中國文化安全的威脅〉，《新西部》，2010年第12期，頁89。

註9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頁1033。

註91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中國共產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檔案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33。



出允許社會資本和外資進入文化產業。【註92】2010年3月5日中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國家發展、民族振興，不僅需要強大的經濟力量，更需要強大的文化力量。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和靈魂，是一個民族真正有力量的決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響一個國家發展的進程，改變一個民族的命運。【註93】中共近年來一系列有關文化觀點官方文件的提出，顯現出中共對此議題的重視。

正如杭亭頓「文明的衝突」所持的論點，當中共綜合國力快速上升後，文明的衝突才剛開始。由於當前國際社會的體制、秩序與價值發源於歐洲，而且西方國家長期在國際社會中佔據強勢或主導地位，國際社會中的核心價值與行為規則，基本上也可以說就是西方國家所宣導和認可的核心價值與行為規則，它們被認為是國家在國際社會中具有合法性的重要依據。【註94】中共正在崛起，這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共識。但是，對於崛起的中共到底是國際社會中的維持現狀國家，還是革命國家或者修正主義國家，中共崛起對於國際社會來說是機遇還是挑戰，西方世界是要遏止中共的崛起，還是把中共融入國際社會等問題，西方觀察家們卻一直有著不同的看法和認識。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分析家習慣於從所謂中共的「中央王國」意識和「百年國恥」心理，來判斷崛起的中共之未來行為方式，十分擔心一個強大的中共可能讓世界面臨新的「黃禍」威脅，面臨東西方不同文明之間的對抗。【註95】可以預期的，當中共強大到具有主宰世界能力的同時，東西文明間的衝突將越演越烈。

陸、結論

中共基於國家戰略考量，自1978年以來，和平外交政策已成中共對外關係的主要方針，以取得有好睦鄰的國際環境，利經濟發展。然而，當中共推行和平外交的同時，卻在權力結構的限制下，隱藏著主權利益與責任利益的限制與危機，足以對當前外交政策產生限制與挑戰。在主權利益方面，因應和平外交政策的推動，中共雖然對主權爭議，如臺灣問題與領土爭議分別採取，「一個中國、一國兩制」、「

註92 朱虹，〈文化外交折射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新東方》，2010年第5期，頁69。

註93 鄧清柯，〈文化是一個國家的命根子——論文化立國的戰略價值與意義〉，《湖南社會科學》，2010年第6期，頁130。

註94 Gerrit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p. 66.

註95 David Scott, *China Stands Up: The PRC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 4-19, 83-85, 167-168.



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和平手段，然而主權問題關係到一國的國格與戰略利益。

正如鄧小平認為，國家主權是不可談判的。國家對其領土享有不受外部干涉的獨立的管轄權是國家主權含有的重要內容之一。1982年9月，當英國企圖在1997年以後繼續管治香港時，他斬釘截鐵地對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說：「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註96】}加以外部因素的介入，使得當前中共主權問題更為複雜，隨時都可能使中共陷入因主權問題所產生違反和平外交政策的危機中，可以說主權利益在結構上與經濟發展所需營造的和平策略是相矛盾的。

另外，中共的責任利益，當中共綜合國力快速提升後，責任利益成為國家發展不可逃避的議題。原霸權國家(美國)感受最為強烈，「權力轉移」的過程與趨勢將對國際局勢產生重大的影響。所謂「權力轉移」，其基本含義乃是指由於世界政治中國家實力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國家在國際權力結構中的位置所發生的原有的主導性大國(Dominant Power)地位下降，而新崛起的大國(Rising Power)地位上升，並獲得主導性地位的權力變化過程。歷史顯示，世界轉型通常有利於後發國家。^{【註97】}因此，早在1990年代初期，各方對中共崛起的議題爭論不休，其中涉其兩個重要問題，中共的經濟及軍事能力崛起的速度與世界特別是美國將以何種方式來回應中共的崛起。^{【註98】}因而有現實主義為理論依據的「中國威脅論」與以文化為訴求「文明衝突論」的出現，而確實也成為中共如何面對世界的兩大分析視角。中共的威脅與原主導力量的權力競爭過程中，將對中共是否能順利推動和平外交政策，以達到塑造和平國際環境，配合經濟發展國家戰略的達成，形成另一項限制與挑戰。

作者簡介

助理教授李明正

學歷：空軍軍官學校67期、政戰學校政治學碩士、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經歷：空軍官校軍學部教官、空軍官校通識中心社科組助理教授，現職：大仁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註96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頁13。

註97 林利民，〈中國對外戰略：新問題、新任務、新思路〉，《現代國際關係》，2010年第11期，頁23。

註98 Michael E. Brown, Owen R. Cote, Jr.,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Rise of Chin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David Shambaugh, "Containment or engagement of China: calculating Beijing's respons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2 (Fall 1996), pp. 180-209; Gerald Segal, "East Asia and the constrai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 (Spring 1996), pp. 107-135.